

西楚时评

主持人 陈秋实 邮箱 cq9790702@sina.com.cn

如何将乙肝歧视封存于历史

教育留守少年要有新思路

我市有几十万外出务工人员,他们给全市留下了大量留守少年。记者在某乡村中学初二年级了解到,该年级每班都有一半学生有父母在外打工,其中父母同时外出打工的占全班总人数的一到两成。有些留守少年学习自觉,成绩优秀;但也有些留守少年表现不好,甚至在社会上游荡,走上犯罪道路。《宿迁晚报》12月29日第9版)

自从留守少年出现以来,我市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都对教育留守少年非常关注,成立了留守少年之家、留守少年帮教中心,拨出留守少年救济金,付出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学校也非常关爱留守少年,成立了关爱留守少年领导小组;教师是留守少年的直接教育者,更是为广大留守少年付出了很多心血。我市留守少年教育总体情况良好,与政府、教育部门、学校的重视、关怀和教师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留守少年教育问题也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的重视和关怀,代替不了具体的教育工作;具体的教育工作还要依靠家庭和学校,尤其是和留守少年朝夕相处的教师。但是,教师也有难处,教育留守少年工作只是他们教育教学工作的一个部分,他们日常工作不可能以留守少年为中心;升学率的压力对教师影响很大,这就使他们更多地关注那些能考高分的学生——而这样的优秀学生,恰恰很多都不是留守少年。另外,留守少年在和同学的日常相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会有一些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会以强烈的叛逆形式表现出来,增加了教育的难度。

由此看来,教育留守少年,依靠旧思路、老方法是行不通的,必须换个新思路。

曾经有教育工作者提出,成立一所留守少年专门学校,解决留守少年的教育问题。

在这所学校里,根据留守少年学习情况制订教学计划,确定教育方法;教育教学的重点不是为了学生考取大学,而是掌握一两门技术本领,做一个勤劳本分的劳动者。

在这所学校里,教师担负的不仅是教育教学方面的工作,还将扮演父母亲的角色;他们将听取学生的感情倾诉,充当学生的思想感情驿站,解决他们人生成长道路上的问题。因为大家彼此身份相同,留守少年的自卑感将在这里消失,强烈的叛逆情绪将会减弱。

在这所学校里,甚至连作息时间表都根据留守少年的特点来安排,比如双休日,学生可以留在学校,由教师托管。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留守少年都要来这里上学的。留守少年是否到专门学校来,取决于父母亲的意见以及留守少年自己的决定。专门学校也有别于一般的“差生学校”,因为留守少年并不等于“差生”。

留守少年教育在全国都是个新课题。宿迁向来有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优良传统,希望广大宿迁教育工作者发扬这个传统,在留守少年教育方面勇敢探索,闯出一条新路,使宿迁教育形成特色,展现辉煌。(泗阳 叶敬之)

好事总是多磨,反乙肝歧视也不例外。近日,卫生部终于发布通报称,我国已于近期制定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乙肝五项检查有关政策。限制入学就业的条件中,或将从此少了“携带乙肝病毒”这一条。

当然,政策在出台前还会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这不过是一条百十来字的消息,如果不是各大网站纷纷置顶的话,原本是很不起眼。但这则看似简短的新闻,却引来网友的狂热跟帖。可见“乙肝”两个字,在人们的心里还没有“祛魅”。

关注相关新闻的人,会记得今年8月初,类似的消息曾经出现过。当时是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性肝炎室一位负责人透露的,说是卫生部将出台政策——常规体检表(含入学、就业等)的待选“菜单”中,将统统取消乙肝“两对半”这个项目。但是该消息被广泛转载后,当晚卫生部发言人就出面“辟谣”,说这仅是专家观点,不代表官方意见。

现在,卫生部终于确认了专家“预言”。对反乙肝歧视来说,这“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任何推进反乙肝歧

视的努力和进步都不嫌晚。但是,从上次那场“紧急辟谣”,也能大致估摸出反乙肝歧视的社会阻力又是何其巨大。即便官方已经在致力于相关的政策研讨,却仍然显得小心翼翼谨慎有余,在没有正式出台前,竟都不敢向外界透露半点风声。

不知从何时起,“乙肝”已成为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字眼,因为它总和“歧视”相伴出现。不幸沾染上这两个字,入学、就业之门可能就基本关闭了。于是,跨越歧视之门,成了乙肝患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最强烈的诉求。在此语境下,自然不难理解为何一条简短的消息,却能激起公众如此强烈的关注。

乙肝,一种被夸大的恐惧。其中强制的乙肝检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乙肝歧视的直接原因之一,正是强制性的乙肝体检。这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一种模糊的“乙肝歧视”的社会观念。强制性乙肝体检在很多国家都是被明令禁止的。不过很多外企在华招工,却都有乙肝检测一项,当然,国内的用人单位也是

如此。即便现在卫生部要求入学就业取消对“是否携带乙肝病毒”的限制,但这种纸面上删除乙肝歧视的努力能照进现实吗?

我们听听招工单位的心声吧:“并非歧视他们,应聘者众多,公司不愁招不到人”。再者,此前虽有法规规定强查乙肝要被罚1000元。但如此低的违法成本,乙肝歧视如何能得到有效遏制,我们恐怕都不能太过乐观。

普遍存在的乙肝歧视,要从社会心理中彻底卸载,显然不是一条政策禁令就能消除的。这需要在大众中普及病理学知识,开展医学“扫盲”。中国乙肝感染人数有1亿多,但我们不能盲目恐慌,因为并非每个带菌者都具有传染性。其次,政府部门也应联动跟进,完善保障乙肝患者权益的法规,提高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加大法律的震慑效力;加大对乙肝患者的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而且乙肝防治上也要体现出公益性。如此,才能将一扇扇乙肝歧视的大门贴上封条,将不堪的过去封存于记忆。

(四川 邱果果)

“山寨洋奖”独爱中国人?

目前还有不少企业和个人,把在国际上获奖当成了惟一目标,甚至“跑奖”、“要奖”蔚然成风,而据《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许多所谓的“国际奖”掺水现象严重,甚至因为中国人的热衷而度身定做,从中渔利。(12月29日《人民日报》)

看到国内频频获各类“国际大奖”,还暗自高兴呢,以为咱们真的站起来走向世界了,想不到原来许多“国际大奖”都是山寨版,是外国人专门为中国人量身定做,忽悠我们的!看来,“牙防组文化”已经发扬光大,走出国门了。洋水的“国际大奖”泛滥,引得国人趋之若鹜,乐得骗子心花怒放,怪谁呢?我看,不是“敌人太狡猾”,而是“我们太无能”。

不久前,韩国歌手张娜拉在韩国称“每次制作费紧张就来中国演出”,就是“钱多,人傻,快来”的国际版,惹得许多愤青一片骂声,可冷静想一想,张娜拉说错了吗?没有,她只不过是说了一句不该在公开场合说的大实话而已。

不说中国商场里的国际奢侈品牌普遍比美国贵50%以上,外国已滞销的高油耗汽车在中国热销,不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深圳20分钟50万美元出场费……仅《环球时报》最近就

连续报道过许多同类事件,如上月月底揭发外国的“野鸡大学”专门骗中国留学生的事情。数天前,还原了奥地利“金色大厅”的真面目,谁出钱就可以租用,而我们还把它当作音乐圣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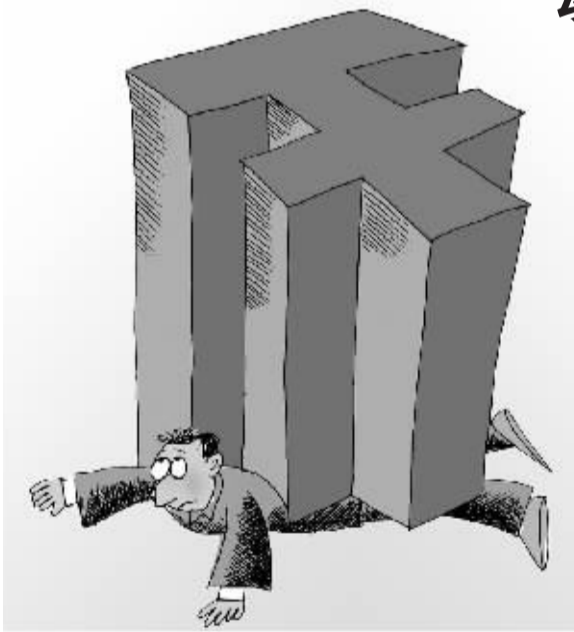
山寨“国际大奖”为何独在中国吃香,某些人明知有诈,也心甘情愿花钱购买?说穿了,无非是迎合、利用国人心灵深处的崇洋媚外情结。国外一项研究证明,男人看见漂亮女人会变“傻”,原因是男人此时急于取悦美女,其他思维则变得迟钝、混乱。同理,人一旦崇洋媚外,急于取悦外国人,也会犯迷糊:洋文凭就是高水平,洋商品就是好商品,洋奖就是最高奖……

盲目崇洋媚外本来就很傻,加上有几个钱,于是就成“钱多、人傻”。外国不是道德国,洋人也不都是君子,明知你“钱多、人傻”也不赚。于是,一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傻事就发生了。

崇洋媚外,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不自信的表现,这在若干年前,还容易理解,人穷志短,而到今天,为什么仍然如此浓厚?莫非,它已融入我们的文化基因,成为一种习惯?值得我们反思。

(练洪洋)

毕画新闻



动弹不了

新华社长春12月30日电: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对桦甸市原副市长朱喜民征地时伙同他人贪污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朱喜民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其他两名涉案人员也被判刑。

局长倒台又让网友猜中了

河北省日前对武安市教育局原局长冯云生“离职前大量调动教师”一事作出处理。冯云生免职当晚签发数百封调令,将数百名农村教师调入城市;此前先后8次收受现金共计8.7万元。对此,河北省决定将冯开除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据新华社12月29日报道)

和“天价烟”局长周久耕的结局相似,这回,又让网民猜对了。

想当初,冯云生与国家机关抢时间,与即将失权的权力赛跑,让权力变现。而面对这样明显违规

的举动,有关部门先是反应迟钝,而后帮冯云生“善后”,表现了对民意的冷漠。

“如果没有利益,局长怎么会废寝忘食地‘工作’?”这是当时网上的质疑,也是普通民众的第一反应。常识表明,乱象背后必有权力作怪的魅影。公众由于核心信息的缺失,在权威部门不闻不问的情况下,基于常识的判断和出于反腐败的义愤,只能选择以“传言”和“网友曝”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非独这一事件使然。只要略微总结一下,就会发现

这样一个传播规律:网友曝一内幕,舆论反响强烈,相关信息越聚越多,但有关部门经常轻描淡写,亲自辟谣;网络舆论更加激愤,终于惊动上级调查,一查就查出大问题。

如今,“网友曝”的“传言”,已经成为一种颇具杀伤力的非正常举报方式。有关职能部门每每在辟谣、否认、解释几个回合后,公信力散落一地。在这种环境里,原有的有效传播机制被侵蚀,社会所付出的机会成本过于高昂,对此,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肖余恨)

农民工相亲会被谁冷落

据《北京晚报》报道,12月26日,望京公园里举行了一场农民工相亲会,因为没有女性参加,最后变成了一场男人派对。

原因是明摆着的:农民工太穷,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太弱。

为什么连同为打工者的女性也没有人来参加呢?这也不难理解。就像“男博士找女硕士,本科男找专科女……”一样,打工女也希望找一个比自己高一个“档次”的男性。

婚姻选择中,女性大多要求男性至少要略强于女性,这不仅是“男尊女卑”传统影响的结果,更是现实生存的需要。在男权社会中,男人处于优势地位,女性希望通过与能力较强的男性结合,来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更重要的是,还要考虑家庭的未来发展,希望下一代受教育、就业、发展的机会比自己这一代更好。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婚

姻之上,对男性的经济能力必然有一定的要求。

那么农民工群体的经济能力怎么样呢?能不能支撑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呢?据武汉大学学生的一项调查,该市300多名即将初中毕业的农民工子弟,只有18%的学生选择上高中,剩下的10%将直接去打工,72%将就读职校或技校。上高中要自费,如考上大学,高昂的学费更让农民家庭望而生畏,读职校或技校也不能加强就业竞争力,学费也不是太高。这意味着很多打工农民子弟将重复他们的父母的命运,基本上靠出卖体力或比较低级的手艺生存。

如果经济增长成为一部分人的盛宴,另一部分人只能在窗外咽着口水观看——一个人数量庞大的打工者人群,有一定百分比的男性讨不到老婆,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是不难想象的。

(戎国强)